

文景

Literary Landscape

第1辑

■
反 观 英 美 批 评 传 统

赵一凡

■
对 慈 父 的 无 尽 怀 念

谈瀛洲

■
那 是 我 生 命 中 的 一 段 风 力

胡晓明

■
不 要 “ 拿 人 类 去 孤 注 一 掷 ”

张庆熊

■
德彪西、马拉美与巴黎的悠闲

贾晓伟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目录

- | | | |
|-------|---|-----|
| 1 | 反观英美批评传统 | 赵一凡 |
| <hr/> | | |
| 9 | 对慈父的无尽怀念
——读奈保尔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 | 谈瀛洲 |
| 15 | 《檀香刑》的一地猫声令我感到恐惧 | 邵元宝 |
| 22 | 一部小说的三种读法
——谈《中国制造》的微妙意味 | 叶开 |
| 87 | “公开堆垛在天地之间”的正才之石
——余光中散文读后 | 周泽雄 |
| 92 | 青春的“务虚”笔记 | 方宇 |
| 100 | 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幸福人生
——读刘志钊长篇小说《物质生活》 | 戴静 |
| 103 | 多重矛盾张之洞 | 蒋原伦 |
| <hr/> | | |
| 29 | 英国画家眼中的明清社会 | 李天纲 |
| 36 | 风住尘香花已尽
——韦莲司·胡适·杨联陞 | 钱文忠 |
| 43 | 从起源上认识科学
——由《西方科学的起源》看近年的一场争论 | 江晓原 |
| 81 | 历史的诗意 | 何非 |
| <hr/> | | |
| 49 | 不要“拿人类去孤注一掷”
——读汉斯·约纳斯的《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
伦理学探索》 | 张庆熊 |
| 58 | 农民的理性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景.第1辑/金良年
主编.——上海:上海
书店出版社,2002.2
ISBN 7-80622-891-8
I.文... II.金... III.书
评-选集 IV.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6171 号

文景
第1辑

主 编 金良年
副 主 编 杨丽华
编 辑 王 琳
俞子林

美术编辑 程 钢
印 制 张伟群
技术编辑 赵晓韵

主办: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出版大楼22楼

邮编:200001

电话:021-53594508-2228

E-mail: wenjing@ewen.cc

印刷: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8

字数:125千字

版次:2002年2月第1版

200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22-891-8/z·18

定价:10.00元

- 60 词语与形象,一个不只是关于艺术史的话题 高名潞
66 访谈:“我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公民” 陈 彦
——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教授谈世界走向,复杂思维和人的自我认识
- 73 那是我生命中一段风力 胡晓明
——读熊十力札记
- 83 经济学就是致富术吗? 梁小民
——经济学笑林新解之一
- 95 我喜欢读的一份经济学杂志 任 晓
98 为富须仁 崔伟奇
——构建后现代主义的企业价值观
- 106 人在秋色中 闻 一
——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 112 金风玉露一相逢 高建国
——记俄国诗人阿赫马托娃和英国思想家伯林的
旷世之恋
- 119 德彪西、马拉美与巴黎的悠闲 贾晓伟

字里行间 (122, 小 蒙)
世纪书情 (28, 35, 42, 72, 118)
编辑书后 (125)

《世纪书窗》自2002年始改名为《文景》,以集刊形式出版发行。

两年来,《世纪书窗》得到了各界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在此,我们表示真挚的感谢,并恳切希望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继续关注这本以书评为主的集刊,继续为我们撰稿。

反观英美批评传统

赵一凡

英国文学史上，文学批评的创始人通常认定是屈莱顿^[1]。大家知道，屈莱顿写过《论戏剧诗》，发表过一些零散文学见解，并率先对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等大作家做出艺术评定。他的批评实践很早，理论也相当简陋。譬如他用古典诗论的美学原则来套裁莎士比亚，套不住的部分，他也没有新解。

[1] John Dryden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屈莱顿，他毕竟是十七世纪的批评家，处于文学批评发蒙阶段。实际上，英国文学批评的源头来自经院哲学，来自教士针对圣经的解读。它从屈莱顿的年代开始脱胎换骨，慢慢发展成一种针对文学文本的系统研究。出于这种背景，文学批评自有一种天生的权威性。它擅长咬文嚼字，训诂考据，并竭力弘扬这种特长，以发掘文本内在的形式、技巧和意义。经过长期演变，文学批评形成了特定范畴，设置了门槛行规。这个范畴包括文字学、美学、阐释学，还涉及到文学评论、文学史一类技术分支。

以上所说的文学批评，并不足以涵盖英美批评传统。它仅代表这一传统微观内向的部分。在此层面之上，还有更为宏观外向的一种批评，即综合性文化批评。与其它民族的诗人一样，英国诗人也喜欢以诗言志，假诗论道。或者说，借用文学批评的名义，实现以文载道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

打开英国文学史，我们不难看到：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斯威夫特的政治讽刺小说，蒲伯的讽刺诗，直到艾狄生和斯梯尔的《闲话报》，以及卡莱尔和罗斯金对资本主义的审美批评——这一传统根深蒂固，内涵丰富，远远超过文学文本批评。而我们对这一路批评较为陌生，原因在于我们的专业观念狭窄，习惯画地为牢，忽略对“非文学批评”的研究。

话说回来，英美批评传统原本就是一种文学与文化的共生物，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分割它。自打解读圣经开始，它的批评对象就超出文字和文本之外。它关注政治与社会动向，顺势而变，调整自身，发展出一系列干预政治、改造社会的煌煌巨论。在此意义上，英美批评传统不单是文学批评，它也是作家、和学者介入政治的纲领，主导文化变迁的蓝图，其中既有道德规范、价值标准，也有艺术理想、精神理念，以及鲜明的政治倾向。

在英国，上述综合性批评传统正式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而这一传统的奠

[2] Mathew Arnold

[3] Culture and Anarchy

基人和护法大师，英美批评界公认是马修·阿诺德^[2]。阿诺德的代表作是一本文集，题名为《文化与无政府》^[3]。下面就此书简单讲讲阿诺德与英美批评传统的关系。

阿诺德：从诗人到文化批评家



Mathew Arnold, 1822-1888

马修·阿诺德 1822 年生于一个教师家庭。其父托马斯·阿诺德是拉各比公学校长，也是英国现代公共教育制度的创建者之一。阿诺德自小在拉各比公学读书，18 岁考上牛津大学。整个青少年时期，阿诺德活泼好动，爱好交际，特别喜欢炫耀诗才，出入文艺沙龙，给人一个花花公子（Dandy）的印象。

阿诺德的父亲早早去世，可他对儿子的影响终生不泯。父亲在神学和政治上都是自由主义者，阿诺德也如此，而且充分继承父亲的道德力量。步入中年后，阿诺德停止写诗，疏远朋友，甚至放弃花花公子的作派。1888 年去世时，他给人们留下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楷模。从花花公子到正人君子，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阿诺德一上大学，就赶上牛津运动。这场运动实为一次宗教改革，它由阿诺德的牛津导师约翰·纽曼教授发起，针对时弊展开神学辩论。请注意，此时英国宗教正经历一次蜕变。纽曼教授看到了宗教衰亡的前景。为凝聚国民思想，他试图把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偷换成一种对于精致文化的信仰。这一文化信仰的核心，不是上帝和圣母，而是诗与艺术的完美，及其内在的和谐秩序。

身为纽曼的学生，阿诺德并不看重宗教。在他的字典上，“文化”就是他的宗教，只不过这是一种较少宗教束缚、较多自由想象的信仰。他从牛津运动中学会了珍爱诗的传统，维护美的秩序。形象地说，牛津校园是他礼拜的教堂；课堂书香培养了他对文化的虔诚，而牛津的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堪称他亲历的神圣洗礼。用他的诗句来形容：“她的花园在月光下缓缓展开，她的钟楼呜咽着中世纪最后的余音”。糟糕的是，如此美好传统，只能让诗人在校园里低吟浅唱。阿诺德一出校门，就陷入毫无诗意的冷酷现实。

牛津毕业后，阿诺德被任命为公立学校学监。他担任此职 35 年，直到逝世前才因病停止。此间他一度受牛津聘用，做过兼职诗歌教授。但相比他的学监工作，诗歌早已沦为一种副业。随着他才思枯竭，俗务缠身，阿诺德只能放弃自己的奢侈爱好。这里我们面对另一线索，即他如何从浪漫诗人变成愤世嫉俗的文化批评家。

早在青年时代，阿诺德就发展出一种对诗和文学的真诚兴趣。可以说，文

学是他的生命主题。可他赖以谋生的学监职业，及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深切关注，渐渐突显为他生命中的另一主题。在牛津读书时，他的文学与文化主题并行不悖。当他成为牛津教授时，他却完全被重大社会问题压倒，专心做起了文化批评。

成年的阿诺德不得不压制自己的诗人情怀，改以教育官员的眼光，来看待英国国情。学监工作让他不断出差，接触各阶层人士，包括中下层人民。而持续多年的英国教育改革，更令他牢骚满腹。1862年，英国政府颁发《教改法案》，该法案迎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追求经济效益，强调实际技能的教学。这一改革扭转了英国教育的施教方向，也改变了学监工作的性质。

教改之前，阿诺德定期巡视他所管辖的学校，他的身份是导师、哲学家和教师的朋友。教改后，他变成统考的监考官，学校财务的督察员。对此阿诺德心怀不满，怨恨多多。他怀念早年学监工作的清高风雅，却无法放弃自己的生计。他在不满中继续这一倒霉工作，不断受到上司训斥，反复倾听长官的夸夸其谈，这令他忍无可忍。他在一篇又一篇的工作报告里揭露教改的荒谬，在各种批评文章中攻击“文明的敌人”。说穿了，他的传世大作《文化与无政府》，就是因不满而发的一套社会改良方案。

《文化》的时代背景与批评主题

《文化与无政府》1869年首版，1875年修订，1882年出第三版。在它面世后的一百年里，此书对英美批评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英国的亨利·詹姆士、T·S·艾略特，到美国的莱昂耐尔·屈瑞林、丹尼尔·贝尔，这两国大凡有名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名人，无不奉阿诺德为思想宗师和批评典范。

用屈瑞林的话说，阿诺德的文学批评功在十九世纪，却泽被二十世纪。他的主要功绩，在于平抑社会动荡，整合破碎文化。他的思想虽然保守，却显出“与世界文化和政治与日俱增的关联意义”。另有美国学者称：阿诺德的《文化》一书为英美现代社会“提供了一整套文学与生活的批评方式及其相关原则”。

《文化》写作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中叶是英国的现代化转型期，它也是英国史上著名的保守时期。我们知道，伊丽莎白女王中年丧夫，而她漫长而压抑的守寡时期，恰好与英国资本主义大发展同步，这便形成一种经济繁荣、思想拘谨的时代格局。

阿诺德在牛津读书时，英国还处于“饥饿的四十年代”。当他走出校门，英国经济已呈现一派辉煌前景，其时代标志就是1851年繁华万千的伦敦博览会。1859年，赫胥黎发表《物种起源》，继而在牛津辩论中，击败保守派代表威尔伯福斯主教。这场辩论象征英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转折点，即现代秩序全面建立，传统文明与观念普遍退却。在这物质主义高奏凯歌的时代，资产阶级不可遏止

地崛起，并向所有传统领域挺进。这促使党派政治激烈，城市骚乱频仍，而传统贵族的秩序和特权，也面临强大挑战。

当时英国社会结构大变，特征是宗教瓦解，非国教人口激增，占到英国选民大多数。面对“群氓喧嚣”的局面，阿诺德明白：英国的未来不属于他这样的世袭精英，而要落入乱民之手。更可怕的是：这些无法无天的小市民（Philistine）一旦得势，肯定会以“阴暗而粗鄙”的观念来改造英国文化。

七十年代前，阿诺德眼中的小市民还生活在“黑洞与角落”里，未对他珍爱的世界构成威胁。然而短短十年，他们成群接队，呼啸而来，占据了社会中心位置。各种暴发的商人、银行家和经纪人不断涌现，给英国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律师、政客、医生、艺术家也纷纷从下层崛起，成为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当上内阁部长、大学校长和艺术赞助人，开始拥有为其子弟专门设立的学校。阿诺德认为，这些人发达的原因，就在于普及型国民教育。为此，教育就成了阿诺德写作《文化》一书的关键词。

“小市民”虽说是阿诺德的困扰，可他很快发现一个更大的麻烦，这就是他所谓的平民（Populace）。与那些迅速爬升的小市民相比，平民阶级人数众多，一贫如洗。他们目睹变革潮流，备受刺激，却得不到变革的好处。所以他们盼望更激烈的社会变革，表现出更多的暴力倾向。身为学监，阿诺德天天围着穷孩子转。那些儿童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营养不良。阿诺德称他们“既没有健康，也没有家庭和希望”。面对这个“被富足微笑掩压”的肮脏世界，阿诺德手足无措，心中惶恐。他发现平民问题不仅是一种难以改变的贫困现象，它更是一个危险万分的革命火药桶。

为治疗国民的粗俗愚昧，阿诺德开出两份药单：其一是全面改造中高等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巩固文明基础；其二是针对混乱的社会舆论，主动开展文化批评，纠正时弊，弥合分裂。这涉及到如何学习“世上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如何让“人的心灵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展开自由想象”。

首先是教育改革。身为学监，阿诺德通晓德语和法语，所以他多次被派往欧洲大陆考察教育，并向政府递交报告。他还发表过《欧洲大陆国民教育》、《欧陆公立学校与大学》等著作。借助报告和著作，阿诺德频频呼吁英国政府，要向欧陆国家看齐，尽快建立先进教育体制。可他的呼吁无人理睬。浪



费多年心血后，他被迫掉转目标，改以侧攻方式，来发挥他所擅长的“讽刺武器”的威力。这就是“在文学伪装之下”，开展一种绅士味十足的“自由批评”。

《文化》的批评主题：阿诺德的批评生涯在此背景下展开。面对时代剧变及其未知后果，他满心焦虑。焦虑于是成为笼罩《文化》全书的主调。阿诺德在书中哀叹英国文明基础浅薄，抱怨人民素质低下，指责统治阶级自私狭隘、缺乏应变准备。他写道：“我看见一波大浪，它在道德、精神和社会方面，都将远远超过美国人的俗鄙。这个浪头呼啸而来，很快就会击倒并淹没我们。”

如何躲避这场灭顶之灾呢？阿诺德提出要返回传统，重建文化秩序。而他极力推崇的文化标准，理所当然来自古典诗歌和文学精品。在他心目中，文学与生活之间从无任何界限。他在《文化》中的一大努力，就是为英国民众细致描述古代艺术的理想境界，强调传统的完美至上。他尤其喜欢咏叹歌德和一些古希腊诗人的作品，因为这些诗作最能体现他的文化理想。他不厌其烦地赞美古老而遥远的文学范例，为的是说明和谐文化的甜美与可贵。

确立理想之后，阿诺德的任务便是讥讽时弊，痛斥当下英国文化的低下粗俗。他主动向“小市民”宣战，以捍卫自己珍爱的传统标准与文化秩序。《文化》实际上是在论战气氛下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讲稿和文章。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阿诺德与卡莱尔的辩论。

我们知道，卡莱尔发表过许多同情民众、反对资本扩张的进步言论，并因此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可在民众骚乱的严重情势下，卡莱尔惊恐万状，呼吁上层贵族夺权，建立集权统治。应该说，卡莱尔和阿诺德都强调秩序和权威。卡莱尔声称，惟有贵族掌权，英国才能获得秩序。阿诺德则提出一种自由主义选择：让全体人民学习文化，从中学会自律自尊，方有牢靠的社会秩序可言。他坚信“文化能祛除阶级差异，造就世上最美好的思想和知识”。

对阿诺德批评思想的评价

1939年，美国自由派批评家屈瑞林发表著名评传《马修·阿诺德》。此书公认是阿诺德思想研究的里程碑。依据屈瑞林和其他专家的研究，我尝试归纳阿诺德的批评思想与影响如下：

作为诗人，阿诺德诗才有限，在同代诗人中排行老三，位于布朗宁、丁尼生之后。但他的杂文批评位列第一。1865年他出版自己的牛津讲稿，取名《批评文集》。七十年代，他因发表《文化与无政府》正式成名。此书大大拓展了英国文学的批评领域。可以说，阿诺德在诗歌创作和文学评论上的成就，只为他赢得一个发言位置。而他对英国社会的贡献，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来自文化批评。

作为批评家，阿诺德的批评从未受到文学的局限。他对文学的定义是：文

学是一种“生活的批评”(a criticism of life)。以他为首的这一路现代英美批评,主要成就也不在于文学文本的分析鉴赏,而在于它借古讽今、匡正世风的社会功效。后世评论家说:“他比同代诗人更好表达出时代的特征,即在工业成就辉煌而虚浮的外表下,他发现并指出:英国社会的心脏已被一种怪病袭扰。”

作为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批评家,阿诺德对后世影响多多。艾略特说过:二十世纪学院派的文学见解,基本上是在阿诺德那里酝酿成形的。麦迪尔逊列举一长串英美批评家,诸如George Saintsbury, A·C·Bradley, W·H·Ker, Irving Babbitt, 指其为阿诺德传统的传人。另有专家说:“鉴于他所发挥的影响力,他给英国批评留下的深刻烙印,及其信徒对他抱有的盲目崇拜,阿诺德在英国的地位就如同亚里士多德。”下面列举阿诺德批评思想的两大基本特征:

现实主义的思想平衡术:阿诺德批评思想的核心,是一种屈瑞林称作“辩证法”的折衷态度。这种态度,令我们很难把他的立场限定为左派或右派。一如艾略特所说:阿诺德既非革命者,亦非反革命,也不是什么中立派,他的目的是让欧洲的历史与时代共进。屈瑞林说,阿诺德生活在一个传统崩溃的时代,他企图从每一种传统中拯救最好的部分。为此他不断遭受攻击,在派系之间往返折冲,安排妥协,以求得现代人的精神平衡。屈瑞林又说,这项工作不是人力可为,而是历史才能完成的工作。阿诺德的思想魅力,正在于模仿历史老人,即采取长远目光和折衷方法。

必须指出:阿诺德的批评思想柔弱零乱,不成系统。他本能地抵制左派历史批评和大多数科学方法。后人指责他视野狭窄、书生气、而且古董味太浓。艾略特说他缺乏“有关恐怖与辉煌的想象力”。另外,他顽固地厚古薄今,即以古代艺术为最高境界,其它一切都是堕落和模仿。更让人好笑的是,他把伦敦主教奉为道德楷模,喋喋不休地提倡道德批评,鼓吹社会劝善。

阿诺德依赖古典文化支撑信仰、抵制无政府和激进主义。他这种软弱的自由主义,势必在现代政治冲突中惨遭失败。可他作为文化批评家,确能为现代文人提供精神支持。他的诗人情怀,理想主义,他介入政治的勇气,确为后来的英美自由派知识界所景仰。

诗的文化功能:统一与聚合。阿诺德的批评思想确立于1848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那一年。当时法国人血流成河,英国人惶惶不安,阿诺德开始关注宪章派诗歌创作,积极参加街头集会。这引起他对诗歌风格和功能的兴趣,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见解。

在他看来,风格是诗人性格的表现,风格也是伦理与秩序。他说诗有两大功能,“一是丰富人的思想情感,另一项则是利用声调、隐喻和壮美风格,来构造和提升人的心灵”。然而他发现:十九世纪为诗大不易。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剧烈变化,诗人和读者的生活日趋破碎。破碎导致诗歌风格与内容的矛盾,现代诗因而“在片断和装饰中遗失了自己,它无法将自己推向完整。”于是阿诺德

建议：现代诗应像宗教那样，具有调谐、弥补与凝聚的功能，以便将杂乱世事归结为完整有序的统一体。

阿诺德写诗赞美他的导师，古希腊诗人索非克利斯，说他能将看到的事物全都归入完美。可惜的是，西方诗歌从黄金时代一路向白银和黄铜阶段跌落。到了十九世纪，济慈、雪莱、布朗宁才华洋溢，却只能写出“精致的碎片和意向”。阿诺德批评说：“诗人首先要对世界抱有一个坚定信念，才不会被它的繁杂多变弄混头脑。”

统一和聚合，就此变成阿诺德难忘的批评主题。对他而言，统一不单是个人思想行为的一致，它还涉及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在亟需统一的时代，济慈、雪莱的浮华诗风，无疑就是一场灾难。对此，阿诺德坚决反对，并号召国人阅读古希腊诗篇，以示抵制。而“那些不懂希腊文的人，只可阅读弥尔顿和部分的华尔华兹。政府应对此事严加监督。”

可悲的是，阿诺德如此强调诗的文化功能，以至摈弃了他自己的浮华气质和诗人情怀。应当说，他是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放弃了个人偏爱。45岁那年，他出版了最后一卷诗集。这一卷很单薄，却让他写了十五年。此后二十年中，阿诺德再也没有写过一句诗。他悲伤地承认：“缪斯已离我而去。”

英美批评与欧陆批评的差异比较

上面所说的“英美批评”，乃相对“欧陆批评”而言。在我们俯瞰西方文论地图时，不可忘记另一支的存在，这就是同英美批评并驾齐驱、长期竞争的欧陆批评。我之所以“反观”英美传统，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难以了解全貌。唯有跳出巢穴，在一个大背景下进行多项比较，方可有一个清醒认识。

大家知道，当今西方批评理论大多起源于以德国、法国为首的欧陆哲学。而文论思潮的走向，也由一批讲德语和法语的思想家所支配，诸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福柯、哈贝马斯。这就产生一个有趣现象：英美大学里文学批评的核心理论、领军思想家及其主导的批评风格，越来越趋于“欧陆化”，而原本英国味的批评传统，则日益变得混杂、多元、乃至全球化。

从哲学源头上讲，英美批评与德法批评的来路大不相同。我们知道，德国哲学精于思辨和批判。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它一贯以革命理论闻名于世。而法国人崇尚革命，热衷创新，也为激进思潮贡献多多。相比之下，英美批评就显得中庸世故：它既缺少德国人的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也没有法国人的浪漫激情与时尚追求，反而处处留下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思想印记。

从政治上看，英美批评一向以老牌自由主义自居，但它这种自由主义天生局限，脆弱多变。每遇革命高潮，它就回归保守，甚至沦为革命对象。提醒大家，这种天生的局限性与保守性，曾引发它同两场革命的冲撞，并导致自身严

重断裂。这就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六十年代末新左派学生造反。

打个比喻，英美批评好比儒雅绅士：他出身殷实家境，自小养成一种保守心态，即安分守己、求稳怕乱、感伤怀旧。一方面，他十分在意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他极善于建立秩序，呵护文化遗产。由于长期养尊处优，他变得细致琐碎，固执偏狭，甚至会情不自禁求助于宗教。从T·S·艾略特到丹尼尔·贝尔，我们不难看到英美批评传统中这一特殊宗教情结的延续。

最后提醒一句：在对待文化传统和秩序的态度上，英美和欧陆确已形成某种对立。譬如说，英美看重修复整合，德法喜欢分析拆解。德法强调针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英美则念念不忘道德批评和社会劝善。对此，我们无需偏向某一方，只要承认差别、心中有数即可。



对慈父的无尽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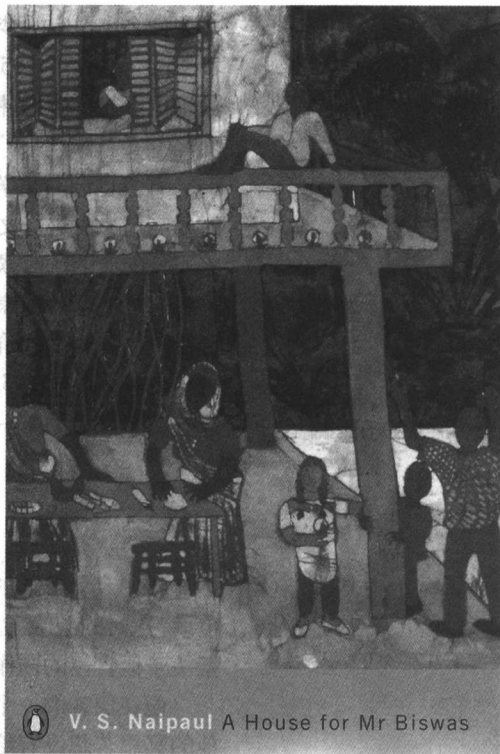
——读奈保尔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

谈瀛洲

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1]1932年出生于特里尼达的查瓜那斯^[2]镇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它虽属印度高等的婆罗门种姓，但却非常贫困。他的父亲西帕萨德·奈保尔只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年轻时打过各种各样的短工，但依靠自学，终于成了特里尼达《卫报》的一名记者。他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

奈保尔在童年时，他父亲常常会把他叫去，读给他听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英国文学作品的片段，比如莎士比亚剧本《尤利乌斯·凯撒》中的几段演说，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些片段，等等。他一边朗读，一边讲解，奈保尔发现他很容易就喜欢上了他父亲所喜欢的东西，并在他头脑里形成了一部他所谓的“我自己的英国文学选集”。在殖民地学校里，他学习的是《柯林斯经典系列》，如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等，但他对学校里所教的文学作品毫无感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奈保尔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与传统主要是英国的或西方的。这种文学传统引发了他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望(他自己说他在十一岁时就立志成为一名作家了)，但却属于一个遥远的国度，描写的是他陌生的生活。

奈保尔曾说，他早年的梦想就是去英国：“我从来没想过要留在特里尼达。当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写下了一句誓言，要在五年后离开特里尼达。我在六年后离开了，但到英国后许多年……我还会被回到了赤道地带的特里尼达的噩梦惊醒。”离开他们所处的“落后”国家，前往一个“先进”国家求学并在那里



V. S. Naipaul A House for Mr Biswas

中译本即将由江苏译林出版社出版

[1]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2] Chaguanas

取得成功，是许多生活在殖民地或“后殖民”社会里面的人们的共同心愿。

1950年，奈保尔以优异的成绩，从特里尼达的殖民地政府那里赢得了一笔丰厚的奖学金。这样的奖学金当时一年只有四个名额。拿了这笔奖学金，他可以在大英帝国的任何高等学校学习七年。他选择了牛津大学。现在的奈保尔并未对他在牛津这所举世闻名的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感到自豪。他说：“这是个错误。我不该去牛津。我仍为我这样做了感到羞耻。牛津是所很糟糕的二流乡下大学。”

奈保尔能去牛津深造，当然很令他的父亲感到自豪。他也并未如他前面所说的那样，在牛津毫无所得。西帕萨德曾让他儿子从牛津写信给他，详细描述他在牛津的生活。2000年，这批书信结集出版了，名字叫《父子通信》(Between Father and Son)。它包括了从1950年奈保尔离开特里尼达时起，到他父亲1953年因心脏病去世为止之间的通信。跟一般的父亲不同，他无保留地支持奈保尔成为一名小说家的梦想。“不要害怕成为一名艺术家。D.H. 劳伦斯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家。”1952年7月，当父亲得知儿子的小说被出版社退稿时，就写信鼓励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像扔在水里的软木塞：我们会沉下去一会儿，但我们马上又会浮起来。”

有着自己的文学抱负的父亲，向儿子描述了自己因为生计的压迫，而没有时间与精力去进行文学创作时感到的绝望：“现在该是我去写作那些我如此渴望去写作的东西的时候了。现在该是我成为真我的时候了。可我怎么才能得到这种机会呢？下班回家时我已精疲力竭。《卫报》耗尽了 my 精力——去写那些废话，比如腌鱼的价格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西帕萨德在1953年因心脏病去世，时年四十七岁。只要再活三年，他就可以看到奈保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神秘的按摩师》^[3]出版了。

[3] The Mystic Masseuse, 1957

二

1954年，奈保尔结束了在牛津的学业，怀里揣着屈指可数的几镑钱来到了伦敦。这时的他除了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决心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包括关于他自己的创作的题材与设想。

他在伦敦的一个穷亲戚接纳了他，让他住在地下室里。在开头的十个月里，他的冥思苦想没有给他带来一点结果。但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他的创作题材：“我们当时感到疏离的(特里尼达的)城市街道上的多种族的生活，还有在这之前，带有记忆中的印度风俗习惯的农村生活。当我找到它的时候这似乎很容易，但它却花了我四年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语言、风格与色调，就好像风格、题材与形式是一个整体。”奈保尔这一时期的作品，有《神秘的按摩师》、《埃尔韦拉的选择权》^[4]、《米格尔大街》和《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5]等。

[4] The Suffrage of Elvira, 1958

[5] 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

1961年出版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常常被称作奈保尔的杰作。无论如何，这是他描写他记忆中的特里尼达生活的一部代表作。这也是一部为纪念他新近故去的父亲所作的书，因为书中的主人公比斯瓦斯先生就是部分地以奈保尔的父亲为原型的；它寄托了奈保尔对慈父的无尽怀念。

小说中的比斯瓦斯先生跟奈保尔的父亲一样，出生于一个印度移民家庭，父亲是甘蔗种植园的劳工，属印度最高的婆罗门种姓。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种姓虽然跟财富已没有什么关联，但在比斯瓦斯先生的一生中还是常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斯瓦斯先生的出生伴随着许多不祥之兆：他是逆生的，一手长有六指，而且生于半夜那不祥的时间。他的外祖父母按习俗请来了一位婆罗门学者，后者预言他将不利于父母，他的喷嚏尤其不吉。化解的方法是让他避开水流与树木，并且在他出生以后的二十一天里不能让他亲生父亲见他。

比斯瓦斯先生的六指在他九天大的时候掉了下来；这与他的脐带被一起埋在了他外祖父母的屋子后面。这也许象征着，尽管是移民的后代，比斯瓦斯先生跟这块土地的一点血缘联系？

但即便是这一点点的血缘联系，后来也被消灭得一干二净。比斯瓦斯先生在进城并（跟奈保尔的父亲一样）成为一名记者以后曾回到他出生与度过童年的地方，结果发现他的家庭如此廉价地出售给了别人的土地已经成为油田：“比斯瓦斯先生在寻找他度过童年的地方的时候，只见到了被‘禁止吸烟’的警告牌包围着的钻探井架和起伏不停的油泵。外祖父母的房子已经杳无踪影，因为用茅草与夯土建造起来的房子在被推倒后不会留下一点痕迹。在那不祥的深夜被埋掉的他的脐带，还有在不久后被埋掉的他的六指，都已成了尘土……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比斯瓦斯先生的出生与童年的任何见证。”这样，作为印度移民的后代，在他出生的特里尼达这片土地上，比斯瓦斯先生也摆脱不了无根的感觉。

尽管采取了那位婆罗门学者建议的种种预防措施，他的预言还是一一实现了。婴儿时的比斯瓦斯先生的喷嚏确实不吉。他只要一打喷嚏，他父亲就留在家里不出门。有一次父亲已经跨出了家门，突然听到了儿子的喷嚏声：他还是去种植园干活了，结果大腿受了伤。

在成长为一名男童以后，比斯瓦斯先生为一位邻居放养一头牛犊。这时他违反大人的禁令，偷偷溜到水边玩耍。牛犊走失了，在一个水塘里淹死了。比斯瓦斯先生吓得躲了起来；而他父亲，一个潜水好手，却在水塘里寻找他的“尸体”时淹死了。

在父亲淹死之后，比斯瓦斯先生的母亲带着他投奔了一位比较富有的亲戚。后者曾想把他培养成一个婆罗门学者。他属婆罗门种姓，因此有成为一名婆罗门学者的先决条件。但他在师傅家不但偷吃了东西，而且用秽物玷污了一棵圣树，最后被逐出师门。至此，那位婆罗门学者关于他的预言已经全部实现。

迄今为止，奈保尔还是主要着墨于特里尼达的印度移民所保存的印度民俗或者说迷信，换句话说是在卖弄异国风情。但在此后，他描述的比斯瓦斯先生的生活带上了一种更为严肃的意义，那就是他对个人独立与身份的追求。

三

在写到比斯瓦斯先生在父亲淹死后，不得不随母亲离开在农村的故乡的时候，奈保尔说，“于是比斯瓦斯先生不得不离开了他拥有某些权利的唯一——幢房子。在这之后的三十五年中他将成为一名流浪者，没有一个他可称之为自己的地方，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庭，除了他挣扎着从图尔西家族那淹没一切的世界中创建起来的家庭以外。”图尔西家族就是比斯瓦斯先生的妻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嫁”进去的那个家族。

离开故乡、投奔亲戚以后的比斯瓦斯先生的生活，总是由他人替他安排：他的亲戚先是安排他学习成为一名婆罗门学者，然后又把他安排到一家小酒馆中做酒保。在两者都失败之后他打起了为店家画店招的零工，在这过程中他喜欢上了较为富有的属婆罗门种姓的图尔西家族的女儿，并被接纳为女婿——不是因为他的财产，因为他身无分文，而是因为他的婆罗门种姓。图尔西家族对众多的女儿的婚姻并不重视，只想尽快、费用尽可能低地把她们嫁掉，或者说是让她们招进女婿，使他们成为家族廉价的雇工。

生活在图尔西家族大房子里的比斯瓦斯先生既没有个人或小家庭的空间，更得不到他们对他个人的独立与身份的认识和尊重。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家庭：连他孩子的名字都是别人替他起的。他甚至无法为自己的孩子买一件与众不同的玩具：因为姐妹们的嫉妒，他的妻子最后不得不把他为女儿买的一幢昂贵的玩具房子砸烂。图尔西家族总是试图安排他的生活：他们先是安排他成为家族拥有的一家店铺的小店主，然后又安排他成为甘蔗种植园的工头。

奈保尔的父亲在给他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感到自己堕入了圈套。”比斯瓦斯先生也感觉到自己堕入了圈套：婚姻的圈套，家累的圈套。结婚时他没能从妻子家得到任何嫁妆，婚后不久他又很快有了四个孩子。如果说他不能在现实中逃脱这个圈套，那他就在幻想中逃脱这个圈套。跟奈保尔的父亲一样，比斯瓦斯先生开始了文学写作，并且意味深长的是他始终未完成的那部小说的题目就叫《逃脱》：“主人公堕入了婚姻的圈套，背上了家庭的重担，他的青春已经逝去，这时他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长得苗条，几乎可以说瘦弱，穿着白色的衣服。”但这个故事跟比斯瓦斯先生的多数决心一样，最终也不了了之。

比斯瓦斯先生总是对环境不满，可是又得过且过；他对未来总是抱有远大的理想，可是又眼高手低，力不从心。奈保尔十分善于替我们描写他身处的破烂不堪的环境：“厨房是个临时搭起来的破棚子。它用弯弯曲曲的树枝做柱子，

大小不等的波纹马口铁做房顶，几乎任何东西做墙壁：几块马口铁，几片帆布与竹片，几块店里纸箱上的硬纸板。一面墙上留出了一扇窗的空间，可是原来的长方形已经变成了长菱形。”比斯瓦斯先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心安理得，并不试图加以改变。他生活在一种临时性之中：对他来说，现时不过是一种过渡性阶段，因此不值得费力加以改变：“他们的真实生活不久就会开始，在别处。”正是这种临时性，成了他懒惰的籍口。

在奈保尔笔下，不仅是比斯瓦斯先生，特里尼达的所有印度移民，都生活在这种懒惰的临时性之中：“他们不能说英语，但对他们生活在其上的土地又不感兴趣；他们来只是为了住一小段时间，结果留得比他们预料的要久。他们总是谈论着回到印度，可是当机会来临时，许多人又拒绝了，他们害怕未知的事物，害怕离开那熟悉的临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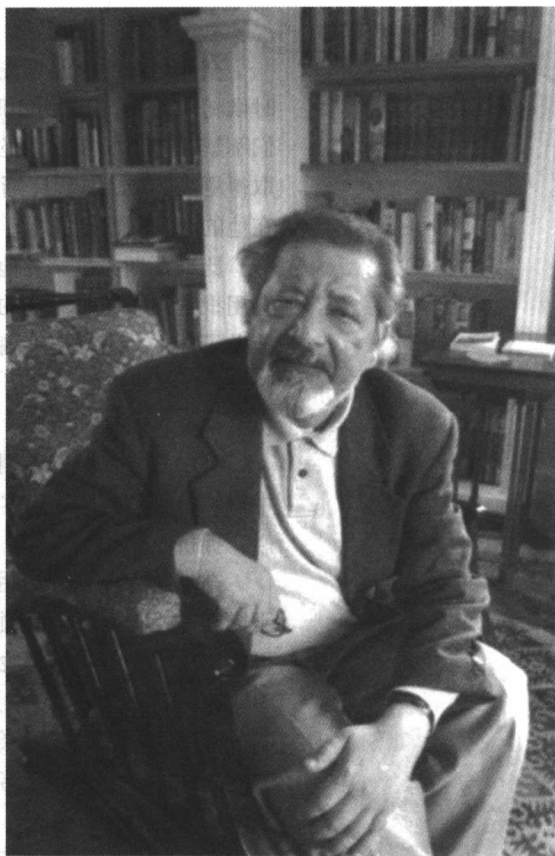
但如果比斯瓦斯先生跟奈保尔笔下多数的印度移民一样，那他又不值得做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了。他的悲剧性在于，在他的内心里他总是感觉到“某种更高尚的目的在等待着他。”他对个人的独立与身份的追求，集中表现在他对一所独立的个人居所的追求上面。

他曾两次试图为自己建造一所房子。可他不是一个实干家，不是一个很有效率、很有办事能力的人，老是受骗上当。他总是眼高手低；他看中的东西总是超过他钱袋的支付能力；他的一些可悲努力的结果又总是遭到命运无情的破坏。他造的第一幢房子为甘蔗种植园上的劳工纵火烧毁，他造的第二幢房子又为他自己烧荒的火所损。他是一个悲喜剧式的人物。

比斯瓦斯先生一生采取的最富决定性的行为，是他在甘蔗种植园上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之后，最终离家出走，独自一人来到西班牙港。他几乎奇迹般地获得了一家报纸的记者职位，从此生活状况逐渐改善。最终，他买了一幢自己的房子。

这次买房并非完全的成功。比斯瓦斯先生跟以往一样，上了别人的当，付了太多的钱，背了沉重的债。但他和他的家人还是不久即习惯了房子的种种缺陷，开始以它为自豪，并从中获得了自己的家的感觉。

在买房后不久，比斯瓦斯先生即跟奈保尔的父亲一样，因心脏病去世。也



V.S. Naipaul 1932-

跟后者一样，他的一生是无奈的。他从未能够真正“逃跑”。

四

奈保尔对比斯瓦斯先生的态度既是同情的，又是批判的。比斯瓦斯在多数时候随遇而安，但又时不时地与环境斗争一下，而且他的斗争总是取得成果。我们不禁在想，如果他更坚强、更有力，他争取独立、个性与成就的斗争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但比斯瓦斯先生也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作者似乎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儿子阿南德身上。

比斯瓦斯先生溺爱他的孩子们，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厚望，但阿南德很早就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他的父亲。他看不惯父亲的怨天尤人，说他：“不管别人为他做了什么，他总是不满足。”他甚至尖刻地对父亲说：“当我到了你的年龄的时候，我不想跟你一样。”跟奈保尔一样，他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赢得了一份奖学金，去英国留学。从阿南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

书中有许多如前所引的对破烂环境的描写。奈保尔似乎从写作这样的场景中得到特别的快感。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整个特里尼达，就是这么个破破烂烂、拥挤不堪的地方。

奈保尔有极强的运用细节的能力。但这些细节总是令我们精神沮丧。他善于描写破烂、齷齪、猥琐、混乱的生活。我对此虽感佩服，但不免觉得，他是否也该关心一下美的事物，和能够振奋我们精神的东西。

有时我不禁在想，今天的特里尼达人读了奈保尔的这部小说，会作何感想。《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令我联想到张艺谋导演的《老井》、《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描写“中国生活”的电影。它们受到外国人的喜爱，却受到本国人的讥评。今天，一般人来到作为旅游胜地的特里尼达，肯定会看到一个跟奈保尔描写的截然不同的地方。他们跟奈保尔都只是看到了特定时段的特里尼达的一面（可谁又能看到事物的全面？）。因此，奈保尔的小说尽管来自他的亲身体验，我们也只能将他笔下的特里尼达视作一种虚构。

